

高适五十年中进士 依旧成“人生赢家”

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，这是唐代诗人高适送给好友董大的两句诗，安慰落魄的董同学，不要担心前面有没有知己，有没有前途，你这么有才，人脉又那么广，肯定能够大显身手，成为人生赢家。

董大有没有成为人生赢家，史书无载，然而，此诗却成为中国史上最励志的诗句，千百年来，经常被用来安慰处于事业低谷的人。

其实，写这首诗的高适，正好是一个对自己才华有充分信心的人，他积极乐观，虽屡遇挫折，但始终保持奋斗的姿态，最终能够在诗坛和职场都取得成功。

曾是苦孩子： 五十岁才考中进士 而且职场不得志

说起唐朝的诗人，知名度最高的当然是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王维、白居易乃至李贺、李商隐、杜牧等辈，而高适、岑参等所谓的边塞诗人也是处于一流层次的诗坛豪杰。说起高适，除了他的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”，最有名的怕就是这首《别董大》，“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，《别董大》若论知名度，恐怕要超越高适那些边塞诗了。

大部分诗歌，尤其是优秀的诗歌，都是诗人自身经历的一种投射，因为注入了自己的灵魂和心血，所以能感人。高适也曾为自己不被人赏识，找不到知己而苦恼过，忧愁过，甚至彷徨过，他在五十岁前的人生状态就是这样的。

高适生于公元704年，比李白小三岁，本来是河北人，父亲在广东做官，于是跟着父亲在南方生活，可惜父亲去世，于是流落江湖，生活陷入贫困，又找不到工

作，居然要靠蹭饭来解决温饱问题，“客于梁、宋，以求丐取给”。同时代的李白，此时却仗剑江湖，凭着写得一首好诗，赢得粉丝无数，吃香喝辣，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幸福生活。高适跟他比起来，真的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。

高同学虽然落魄，不过他还是有一点没有放弃，那就是读书。他坚持不懈地参加科举考试，功夫不负苦心人，熬到五十岁的时候，总算金榜题名了。推算一下，高适五十岁的时候，李白五十三岁，按照虚龄算，是在公元753年左右，距“安史之乱”只有两年左右的光光了，好不容易考上个功名，乱世就要来了，高同学的好日子似乎转瞬即逝。而那时的李白，已经充分享受过荣华富贵，名满天下了。

高适以半百之龄踏入大唐的仕途，他本来诗写得很好，如果在诗坛，他算个大V，粉丝不少，转发率也挺高。但在职场无非是个小角色。高同学想用诗坛大V的身份来提升他的职场地位，结果李林甫说没门，你还是安心在下面当小官吏吧。

小吏生涯让高适觉得很不开心，尽管人生最重要的还是开心，那时的杜甫好像还是在管兵器库，也是不得志。高同学写了一篇《封丘作》，吐槽一番，“迎拜长官心欲碎，鞭挞黎庶令人悲”，上班上得郁闷，回家又不被家人理解，“归来向家问妻子，举家尽笑今如此”，大家都说他活该。

这个时期的高适同学，前路在哪里？知己在哪里？

高同学辞职了，又跑出去穷游，游着游着，碰上了他人生的第一个知己：大唐名将哥舒翰。

化逆境为顺境： 一场军事大溃败 反而成就高适

高适同学在河西碰到了当地的节度使哥舒翰，哥舒翰绝对不是平庸之辈，他是唐玄宗最倚重的一代名将，征战西域屡建奇功。哥舒翰本人也颇有传奇色彩，他手持一杆铁枪，骑着骏马厮杀战场，每杀一名敌军，就由身边的侍卫将人头收集起来。

哥舒翰是高适生命中的贵人，哥舒翰虽不怎么懂诗，然而他懂高适的才华，也愿意用高适的才华，他不仅将高适提为机要秘书，还毫不吝惜地在唐玄宗面前夸高适的才能，“充(哥舒)翰府掌书记，从翰入朝，盛称之于上前”，高适同学的职场生涯，开始熠熠生辉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公元755年，大唐爆发“安史之乱”，安禄山叛军兵临潼关。谁去平叛？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哥舒翰，朝廷下令哥舒翰带兵出潼关攻击叛军。当时的哥舒翰是哭着出潼关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作为沙场老将，他懂得：最正确的战略应该是死守潼关，以逸待劳，而不是选择在这个时候主动和杀气腾腾的敌军正面交战。跟着哥舒翰一起出关迎敌的，当然有高适。当时的高同学，已经是监察御史。果不出有识人士的意料，哥舒翰大军惨败，当时已经中风坐着轮椅的他，被叛军俘虏，后来又被害。高适同学似乎有点背运，好不容易找着个能改变自己命运的知己，命运却被一场大败仗撕得粉碎，似乎所有的理想就要随风而去了。

别着急，高适同学是顽强的，乐观的，永不言败的，这时候的他，不是选择逃避，而是担负着天下兴亡的使命，独自朝着大唐朝廷撤退的方向追赶，此时的杜甫也在朝着高适同样的方向跑，可惜运气不太好，被叛军活捉，关在长安，写下了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的凄恻诗句，好在后来逃脱

了。而高适的运气相对好一点，他从骆谷往西边跑，日夜兼程，终于追上了正在逃命的唐玄宗。

见到唐玄宗，高适同学不是痛哭，也不是吐槽，而是冷静地总结了经验教训。他认为哥舒翰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其身体状况不佳，头脑不太清醒，“疾病沉顿，智力将竭”，监军麻痹轻敌，纵情声色，不能及时供给将士们军用物资，如此一来，大大削弱了战斗力。然而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杨国忠，昏招连出，犯了战略战术上的致命错误，高适不忘提醒：他本人曾和杨国忠据理力争，可惜不被采纳，“臣与杨国忠争，终不见纳”。

接下来，最重要的是要给朝廷打气，而不是传播沮丧的情绪，高适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，说：今天如此狼狈的撤军，其实也是必要的，避开敌人的锋芒，到了西南地区再整合力量也不为迟，并不是什么耻辱，“陛下因此履巴山、剑阁之险，西幸蜀中，避其蚤毒，未足为耻也”。高适的言论，对当时处于败局的唐朝确实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，逃亡的队伍也因此提振起信心，重新整合力量。

为了表示对高适鼓劲的感谢，唐朝还下旨表扬了他，“感激怀经济之略，纷纷瞻文雅之才。长策远图，可云大体”，说他既有真实才干，又有文学素养，识大体，有长远目光。

高同学的第二个人生知己其实应该是唐玄宗，从此，高适的人生路线一路往上走，一直官至散骑常侍、礼部尚书。史书评价他说：

“而有唐已来，诗人之达者，唯适而已”。唐朝的诗人，在仕途发展得最顺利的是高适。

和其他诗人相比： 高适更多一份 实务才干

当然，这里说高适的人生功名最顺利，并不是说他升职最顺利，职位最高，而是说他对于唐朝历史发展所做的实质性贡献，是所有唐朝诗人当中最高的。可能有人会疑问，张九龄不也是诗人吗？他明明贡献比高适大，其实不然，张九龄首先是政治家、名相，然后才是诗人，高适的最主要身份，还是诗人。

高适作为诗人，能在职场脱颖而出，成为佼佼者，首先在于他的使命感，无所畏惧的魄力，报效国家，建功立业这些词，对于他而言，不只是在诗句里说一说而已，而是在危难的时候能挺身而出，担负起该有的责任，“逢时多难，以安危为己任。”王维在这方面，相对而言确实有点亏欠，他深陷叛军，被迫任职，虽然是迫不得已，但也成为一生污点。

其次，高适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，确实有专业水准，比一般人高明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名将哥舒翰也不会看上他，重用他。高适同学平时除了写诗，确实很喜欢钻研军事之类的课题，长期学习，确定了他的专业素养，虽然有时候被人笑话，但确实关键的时刻能起作用，“喜言霸王大略，务功名，尚节义……然言过其术，为大臣所轻。”高同学不只是学习理论，还有实践经验，他在地方为政，“政存宽简，吏民便之”，办事简练，效率又高，大伙都觉得方便。而李白在这方面，则不太擅长，他在《与韩荆州书》里也承认，筹谋策略，并非我李白所长，“白谬猥筹画，安能自矜。”

人生要成功，知己是少不了的，然而，首先必须得有过人的本领，非凡的抱负，高尚的情操，然后才有人乐意成为你的知己，帮助你，高适的人生道路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(文/刘黎平 来源：《广州日报》)

西洋古地图里，何时开始出现上海

16世纪以后，随着西方测绘技术和地图科学的不断进步以及航海地理大发现，欧洲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上，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。那么，上海究竟何时在西洋古地图上正式出现呢？

明清时期，一批又一批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神秘的东方大国，对中国有了更切身的了解。在开明绅士和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，他们编绘了《坤舆万国全图》等各种地图。这些材料流播到西方，成为西方人绘制地图、认识世界的重要依据。

葡萄牙人作为西方大航海时代

的先锋，是最早从海路来到中国的欧洲人，也是目前所知最早在世界地图上绘制中国的欧洲人。从葡萄牙人绘制的中国地图来看，他们最远到达了舟山群岛、宁波附近。

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，随着新航线的开辟，来到中国的欧洲人越来越多。其中，罗明坚根据《大明官制》等中文资料绘制的《中国地图集》(手稿，未刊)，为目前所知欧洲人绘制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；利玛窦于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《坤舆万国全图》，因刊行于世影响更大。

17世纪50年代以后，欧洲绘制

的中国地图对中国内陆的认知更加深入，精度也有了很大提升。1652年，卜弥格绘制的中国分省地图集——《中国地图册》，系中文和拉丁文对照的地图手稿。这幅地图上不仅标注了中国的省份、重要城市、河流水系等，还列出了动植物、矿物的分布状况。

卜弥格是欧洲汉学的先驱，被誉为“波兰的马可·波罗”，也是第一个把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介绍给西方世界的欧洲人。该地图集中的《南京省舆地图》，主要描绘了江苏省的地理情况。其中，上海、松

江、华亭、青浦和黄浦等均得以清晰标注出来。

1643年，卫匡国到达杭州，主要在杭州、绍兴、宁波活动，因而对上海的情况也比较熟悉。此后又游历了六七个省。他在亲身游历和参考资料的基础上，编绘了《中国新图集》，并于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。这是第一部在欧洲正式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集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因此，卫匡国被后人誉为“中国地理学之父”。

实际上，罗明坚、卫匡国等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并非实测，而大都

乐，就是老百姓也接受他了。”

用儒家的概念来说，我们不妨称孟子重构的理想世界是一个“仁义”的政治共同体。其中，民为“天民”，吏为“天吏”，爵为“天爵”，位为“天位”，“禄”为“天禄”，职为“天职”。这一政治共同体里的君民，自觉按照天赋予的要求行动，世界就不会“仁义充塞”。

这一系列概念，成为孟子反思现实政治的思想基点。当时，燕王哙因为尊信“禅让”学说，就让位给相国之子，天下震动。齐宣王想趁火打劫，便派人问孟子：“燕国可以讨伐么？”孟子说：“可以。子哙无权私自让国给别人，子之也不得从燕王哙那里接受燕国。”就此，齐宣王心安理得地出兵讨伐了燕国。

之后有人问孟子：“您劝齐国

采用了明代出版的中国地图信息。明代出版的中国地图，以罗洪先的《广舆图》影响最著。

此外，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另一幅明代地图《天下輿地图》。全图山丘、河道、沙漠及长城都以形象画法描述，尤以黄河、长江、洞庭湖等水系绘画最为精细。地图中，上海县与华亭县、青浦县同属松江府所辖，吴淞江水道情况亦被清晰地标注出来。

总的来看，虽然上海在宋代就具有一定规模，但在清朝开放海禁之前，大体还是一个地方性港口城市。只是在上海设立海关后，上海的港口地位才真正上升，并为外国人所重视。

(文/牟振宇 来源：《解放日报》)

面对春秋乱局《孟子》如何破题

面对春秋乱局，如果说孔子式“述而不作”尚多隐微的话，《孟子》的思想表达就更为显豁直接。这里，我们从天下视野来看看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世界。

“天下”意识于周初即已形成。《尚书》认为，王位居德命之首，为天下仪则，天下万民次第效法，发扬王之光显。这一上天与下民关系的基础，凝结于《诗经》里的一句话：“天生烝民”。

此句当为周代官方习语，“烝”即“众”也。“天生烝民”的意思是说，天下万民皆上天所生。君王居

于上位是上天让他们代为照看民众，这一任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。如若人间的君主无德，上天就会用看起来邪僻的命令降下灾罚。

下民皆上天所生，内在意蕴有二：一则上天是仁爱万民的，二则民众之间最初并无等级上的尊卑贵贱。接下来，上天并不会直接照看他们的繁育生长，而是选取这一物类中有德之人作为君王代为治理。所以，君王与上天的关系是衍生性的，是对“天生烝民”的保障。

不过，春秋以降，随着“天道远，人道迩”，旧的天人秩序渐次崩塌。

面对这一状况，孟子勇敢地尝试重构这一体系。

《孟子》中有一段对话，万章问：“尧把天下给予舜，有这回事么？”孟子断然加以否定：“不是的，天子不能将天下给予别人。”“那么舜有天下，是谁给的呢？”“是上天给予的。”“上天给予，是反复叮咛言语授命的吗？”“不是，天不会说话，只是用行为与事迹昭示她的意图罢了。”“上天如何用行为与事实昭示自己的意图呢？”“让他主持祭祀，众神都来享用，这就意味着天接受了；让他主持政事，政事都处理得很好，百姓安

伐燕了么？”孟子回答，问我燕国可以讨伐么，我回答说可以。他只就这个意思伐燕，是不对的。他若再问谁可以伐燕，我会告诉他“天吏才可以伐之”。这就像如果有人杀人了，问我这种人该杀么，我会说应该。如果再问谁可以杀他，我会说“只有专司刑罚的士师可以杀他”。现在这样一个跟燕国一样不合天道民心的齐国，我怎么会劝他伐燕？

与前论尧舜禅让一样，孟子认为征伐之事，唯“天吏”可以当之。这是以有道伐无道者，以至于太平。至于当时诸侯的征伐，在孟子看来，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，谁也没有当“天吏”的资格。这大概也是孟子被时王认为“迂阔而远于事情”的原因吧。

(文/成富磊 来源：《解放日报》)